

# 发现与阐释

——  
现代文学史料知见录

刘增杰  
著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发现与阐释

——  
现代文学史料知见录

刘增杰  
著



02132049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现与阐释：现代文学史料知见录/刘增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5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6213 - 2

I. ①发…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  
文集 IV. ①I209. 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7548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  
插 页 2  
字 数 501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  
“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11&ZD110）阶段性成果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2012-CXTD-02）阶段性成果

河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 序 言

关爱和

进入 20 世纪后，报刊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报社、学校、学会、沙龙以及近代中国舆论媒介共同构成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报刊史料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旨在以 20 世纪中国报刊的兴起、发展为切入点，描述 20 世纪在西学东渐、政权更迭等复杂政治与文化背景下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重建过程，揭示 20 世纪文学活动、文学传播和报刊媒介、文学编辑、市场及读者之间的联袂互动。

《报刊史料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与文学的结合物，入手于报刊，立足于文学。它有可能打破作家生平的评述、文学名著的分析、文学体裁分类的传统书写模式，将报刊与文学互动的描述保持在制度、观念、思潮、流派的宏观层面。

《报刊史料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以 20 世纪新思想新文学的重建为研究对象。文学史叙述的主要任务，是使过去的历史得以复活。书写者借助自己的主体精神解读重现历史，在总体上坚持大叙事文学史理念，以现代化作为历史叙事稳固宏大的思想框架，以近代、现代、当代为历史叙事起承转合的三大时间平台，探求一百年中国人的精神涅槃，建立报刊与文学共生共兴的叙述与知识体系。近、现、当代三大时间平台分属不同的政权形态，不同政权所形成的文化文学机制是绝然不同的。依据三大政权把 20 世纪划分为近、现、当代，是一种革命话语。这是我们的书写必须面对的话语体系。但依据现代性的标准，我们还将有另一种话语体系，这就是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文化与文学的现代性，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形成，大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以现代知识体系为基础并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与

文学表达。现代性可以赋予 20 世纪中国文学另一个完整的叙述框架。从这一框架出发，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一以贯之而不曾因政权的更迭而中断。

20 世纪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重建是在古与今、中与外两对既相互冲突矛盾又相互融合支撑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重建，有民族的和西方的两大思想资源，重建的过程是民族传统文化文学和西方舶来文化文学融合生成的过程，充满痛苦，也充满活力。重建之后的新文化新文学，既有中国基因，又有外来血脉。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一样，是活生生的“这一个”。“重现”、“重新复活”中国新文化、新文学重建过程，书写活生生的“这一个”，就是通过文学透视“中国经验”与“中国制造”。理论自信并保持理性判断，饱含同情而张扬批判精神，是《报刊史料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研究应该确立的写作立场。

就传播与文学知识体系的建立而言，《报刊史料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的主要任务是建构。书写者须在对历史文本的阅读交流中，不断形成视阈融合，产生新的成见成果。这些成见成果对已有的文学史可能带来解构与重构。上述目标完成的基础是报刊史料。对史料的掌握、分析、归纳、研究的水平，决定建构、解构、重构的能力。本课题在总体上坚持大叙事文学史理念的同时，不拒绝穿越学科、现象，寻找整体的裂隙与历史的偶然，寻找思想碎片。从报刊史与文学史重合的时间节点上，聚焦问题，发现细节，以富有趣味的历史发现，呈现历史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历史书写的根据主要是史料文本。史料文本与史家的主体精神是相互作用的。对史料文本，要善于阅读发现，更要善于归纳发明。学术预设的立与废，取决于在文学史观指导下作者对史料文本的把握驾驭。书写者在纷纭繁杂的史料文本面前，要具备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善入善出的能力。

在世界范围内，20 世纪是一个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接踵而来的时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面临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精英意识形态、商业意识形态、大众消费意识形态并存合流，精神生产、

商品生产、大众娱乐的界限趋于模糊含混。这一特点和趋势，要求我们在书写中，既要遵守文学史学科的传统规范，防止泛文学化，又要注意上述趋势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着眼于报刊传播与文学发展互动研究，是增加现代文学史观察维度的学术探索，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书写者应注意著述的学术创新、学术水准和学术价值。处理史料文本，应注意独特性、创新性、前沿性。对学术界已有的成说，转引他处的文献，要一一注明。在行文过程中，提倡文从字顺，简明扼要，求同存异，清新稳妥。避免人云亦云，概念堆砌，虚话套话，佶屈聱牙。

“虽不能之，心向往之”，愿与丛书的写作同人共勉。聊以为序。

2015年4月20日

## 内容摘要

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相对薄弱。突出表现是：第一，文献匮乏，史实舛误；第二，重新再版的现代文学作品，不向读者作任何说明，任意修改原作的现象严重；第三，不是依据史料进行客观、辩证的历史评价，学术是非有时只依靠学术以外的力量进行裁决。作者把这一现象概括为文学生成研究中脆弱的软肋。

《发现与阐释——现代文学史料知见录》，是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对上述问题进行的学术探索。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系统。发现与阐释密不可分。发现既包括对已有史料的再阅读；又含纳对研究较少甚至长期被遮蔽史料的深入研思、再发现。本书所设的栏目，如报刊研究与版本考释、作家书信日记研究、钩沉·重读·质疑等，都是作者开拓的研究新空间。发现是研究的基础，阐释是史料价值的呈现。只有阐释，才能够开掘出史料背后的精神，打开文献潜在的历史内容。发现史料与阐释史料的有机结合，研究才真正能够做到“回到原初”和充分发挥研究者主体性的统一，使研究品质得到整体上的提升。史料研究怎样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让研究变得鲜活生动，有血有肉，是作者向往的学术目标之一。作家访谈与学人掠影两个部分讨论的人物，他们既是史料研究家，又是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走近他们，向他们发问、请教，谛听他们有关研究得失的娓娓而谈，获得的不仅仅是史料新的“发现”，同时也可能带来“阐释”的新视野、新角度。

本书和作者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版）是姊妹篇。不妨说，《发现与阐释》是史料的细部展示，史料学是史料研究的骨骼。



## Abstract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ve not been conducted broadly and thoroughly for years. There are three major weaknesses in this area. First, the publications on this subject are insufficient and some of them are erroneous on historical facts. Second, some republished literatures were editorially modified at will from the original work without any notes to the readers. Lastly, the literary criticism is not always carried out in an objective and dialectic manner an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stead, disputes in the academic studies are often judged by forces outside the academic field. The author calls these deficiencies as the "soft ribs" of the research of literature.

The book "Discovery and Interpretation: An Account of the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ims on searching solutions to above issues. The study of lite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an open and developing system. In such a system, discovering materials and interpreting them are always closely linked. Discoveries include both reviewing and re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at have been studied before, and exploring and rediscover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at have either not been studied extensively or been blind to the researchers for a long time. The topics of this book such as Studies on the Newspapers, Journals and their Editions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Letters and Diaries from the Writers, Exploring, Rereading and Questioning, etc., are all new research areas that the author has developed in his studies. If the discoverie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m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ud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m will demonstrate the value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which is the only way to mine out the spirits implied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uncover the hidden historical contents. The integration of discover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makes it possible to unify the researchers' methodologies of going back to the "genuine" raw materials and extrac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ir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which will promot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researches.

With the subtitle "An Account of the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author intends to reveal the efforts on how to turn the researches into lively and fruitful activities by mingling the study of the lite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with the real life activities. The characters who appeared in Sections "Talks with Writers" and "Snapshots of Scholars" are both scholars in the studies of literary history material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subjects in the studies. Approaching them, talking with them, questioning and consulting with them, and listening to their comments on the studies about their works make us to obtain not only new "discoverie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but new views and perspectives on interpreting the materials.

This book can be considered as a companion volume of "The Study of Historic Material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Central West Publisher, 2013) from the author. This book expose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with details, while the previous book describes the core components of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脆弱的软肋

## ——略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问题(代前言)

### 一

文献是一切历史研究的根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相关文献<sup>①</sup>占有、把握、理解的程度,往往直接决定着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的学术质量。文献的匮乏和讹误,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之一,或者说,文献问题是文学生成研究中脆弱的软肋。早在“五四”之后,一些学者在实践中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文献对研究的决定性作用。梁启超断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sup>②</sup>朱自清把那些忙于建构系统、体系的著作称作架子书,说“这些架子书是不能支持长久的:没有东西填进去,晃晃荡荡的,总有一天会倒下来。”<sup>③</sup>“晃晃荡荡”说的就是文献的不实在、不踏实。20世纪4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问题有越来越突出之势。其存在的问题约有如下数端:

第一,粗枝大叶,史实讹误。史实有误,研究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前提,研究的学术价值必然受到严重的损害。师陀(芦焚)是30年代出现的一位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1936年5月,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

① 广义地讲,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本书所使用的文献概念,主要指前人的文献记录以及历史残留遗物等文化、文学史料。为了行文方便,有时也把文献史料放在一起使用。题目上的“软肋”取比喻意义,泛指研究的薄弱部分。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页。

③ 朱自清:《论青年读书风气》,《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转引自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谷》，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37年5月，《谷》获《大公报》文艺奖金。1937年1月，师陀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四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而一部权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在评论师陀小说艺术风格的发展历程时却作了这样的叙述：“芦焚（师陀）的创作倾向，也与这些作家相近。他的《里门拾记》反映了故乡河南的生活：‘绅士和老爷’的横行，‘老实的庄稼汉子’的受难，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作者善于描摹世态，刻画风习，而时复带着揶揄的口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后出的《谷》、《落日光》、《野鸟集》等作品里有更显著的发展。其中的《谷》，以其‘糅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获得了《大公报》的文艺奖金。”<sup>①</sup>就这样，研究者颠倒作品出版时序，把师陀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误认为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加以评论，而把第一部短篇小说说成是师陀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创作上“更显著的发展”。史实的错误使这样的分析完全丧失了学术价值。

一部解放区文学史也犯了类似的错误。该书这样介绍小说《晴天》的作者：“学者王力（1900—1986）著有小说《晴天》，写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为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进行了艰苦的工作，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赢来了太平庄的晴天，较好地反映了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sup>②</sup>这段介绍有明显的错误：首先，解放区小说《晴天》的作者不是学者；其次，解放区小说《晴天》作者王力，江苏淮安人，生于1921年而不是1900年。显然，这部解放区文学史把学者王力当成了《晴天》的作者王力。学者王力，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教授，他从来没有在解放区生活的经历，更没有创作过《晴天》。文献的差错不仅使《晴天》的研究失却了根据，也造成了整部解放区文学史可信度的降低。

第二，不重视阅读原始文献，轻率地使用第二手资料。在何其芳抒情诗研究中，一位现代文学史家就因为过分依赖第二手资料而使自己的研究陷入了困境。1942年4月3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什么东西能够永存》、《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的《诗三首》。何其芳追求革命的赤诚，在新时代与旧生活

<sup>①</sup> 《中国现代文学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页。

<sup>②</sup> 《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的告别，在诗中有着生动的反映。

诗作发表后，延安文艺界展开过热烈的争论，诗作受到了一些人苛刻的批评。在香港，《诗三首》也受到了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误解。在《中国新文学史》<sup>①</sup>中，司马长风把何其芳表现自己心灵变化历程的《诗三首》，说成是“有胆写讽刺诗”来讽刺现实的判断，固然是一种误读（因为何诗中并不存在任何讽刺的情愫）；更成问题的是他对原诗所作的不能允许的摘引。以下是该书所引何其芳的诗句：

年青的同志们：我们一齐走到野外去吧，

……

走到遥远的没有人迹的地方，

把我自己投在草地上，

我像回到了我最宽大、最会抚慰人的母亲的怀抱里，

她不说一句话，只是让我在她怀抱里痛哭一场。

……

一直到完全洗净了我心里的一切繁琐、重压和苦闷。

……

而完全忘记了世界是一个地狱，

而所有的人都是无罪的囚徒。

司马长风摘录的第一行诗，是何其芳《诗三首》中的第一首《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中的倒数第三行。第二行起的四行，则来自第三首《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的第四行至第七行。中间隔了三行之后，又引出一行“一直到完全洗净了心里的一切繁琐、重压和苦闷”（“苦闷”在原诗中是“苦恼”）。又隔行，才是所引用的最后两行。像这样把何诗的第一首和第三首中的个别诗句随意拼接的研究，当然和何其芳诗作的原意相去十万八千里。何诗“无罪的囚徒”一句之后，原是逗号而非句号。一个标点的改动，几乎使诗完全变了味。因为在“无罪的囚徒”一句后面，何其芳接着强调：但很快地我又记起了我那现实的生活，那发着喧嚣的声音和忙碌的生活，我是那样爱它，我一刻也不能离开它。

<sup>①</sup>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37、38页。

我愿意去负担，我愿意去忍受，我愿意去奋斗。我不能接受个人的和平和幸福的诱惑和拥抱！在这些诗句里，一个严于律己、心地纯洁、情感高尚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这才是何其芳抒情诗的真谛和诗的艺术感染力之所在。司马长风的上述研究只能对读者造成严重的误导。造成司马氏判断失误的原因是值得思索的。仔细考察，上述对何诗的拼接，并非出自司马氏之手，而是他使用第二手资料所造成的。司马长风并没有见过《诗三首》，他使用的材料来自中国台湾“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的《中共史论》第4册第408页至第409页。在20世纪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中，党派集团利益至上的基本格局，直接制约着学术研究、学术讨论的平等和公正。党派偏见使《中共史论》编者不顾事实，将他们视为敌对方的作品任意拼接编造，对何诗作了非学术化的歪曲，不但欺骗了一般读者，也蒙住了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眼睛。没有史实的空论，无法为文学史著提供充分的学术营养，它不过是没有生命之根的假花。轻信第二手资料造成论述失误的现象绝非个别现象。这些失误警示人们：阅读第二手资料不加核对，就很容易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不能自拔，进而丧失学术个性，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第三，混淆学术论争和政治斗争的界限，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学术规则受到了漠视。由于学术分歧受学术以外意识形态分歧所左右，一些研究成绩斐然的文学大家，有时也不能以事实为根据客观评价文学的是非功过。他们以语言霸权心态从事的研究，结论当然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郭沫若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某些批判文章，写得就火气很盛，对论战对方充满剑拔弩张的敌意，而无学术论争心平气和的真诚。这些文章由于史料的疲软而失去了亲和力。在声色俱厉地批判所谓“蓝色文艺”（指特务文艺）的代表人物朱光潜时，郭沫若竟说：“抱歉得很，关于这位教授的著作，在十天以前，我实在一个字也没有读过。为了要写这篇文章，朋友们才替我找了两本《文学杂志》来，我因此得以拜读了他的一篇《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二卷二期）”。<sup>①</sup>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对于朱光潜大量的文章和著作不屑一顾，十天以前连一个字也没有读过，为了批判朱光潜才读了他的一篇文章，却可以写出长篇大论的批判文章，这样的学术态度，批评风格，在平常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以郭沫若在文坛所

<sup>①</sup>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第1辑。

处的地位，他的这种对学术的政治裁决，不仅在当时不能说服被批判者和读者，甚至还会在被批判者乃至整个学术研究者的心理上留下长长的阴影。

在对抗战文艺进行总体评价时，茅盾的研究有时同样表现出一种不顾事实的武断。抗战胜利后不久，在总结八年来抗战文艺的历史经验时，茅盾说：“我们即使说过去八年的文艺工作主要毛病是右倾，大概也不算过分吧？”<sup>①</sup> 其实，茅盾当时所下的这一断语是很值得商榷的。姑且不论在文学批评范围内用“左”倾、右倾这一类的政治概念来替代对文学自身的审美分析显得理论上的苍白；即以事实而论，这一结论也和抗战文艺运动发展的实际相去甚远。阅读这一时期的批评论文，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是当时批评的严厉，以及在二元对立意识下作家们特有的警惕目光。在抗战初期众口一词强调文艺的宣传教育功能时，文艺批评家几乎都以势不两立的态度来批判“艺术至上主义者”。把这些所谓的“艺术至上主义者”，视为“汉奸的一种”，判作“非国民的态度”，宣布为“丧心病狂的人”。<sup>②</sup> 随后，对于文艺上被视为异端思想的批评，更日渐严厉。批评家竟至指名道姓，攻击一些作家的作品“是非常有毒的足以消灭千千万万的革命者的斗志的瓦斯弹”，是在汪精卫思想影响下，作家“潜伏着的劣根性的发作，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倡为异说，以动摇抗战”，斥责这些作家“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言论的“结论所含的毒素，却比白璧德的徒子徒孙梁实秋直白的要求，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sup>③</sup> 对当时存在的这些脱离实际的所谓批判，茅盾非但没有抵制、制止，反而把抗战文艺说成是“右倾”。很显然，这一批评同样犯了不尊重事实的历史性错误。抗战文艺“右倾论”至今仍是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亟待清理的积案之一。以政治裁判代替学术讨论的现象，一段时间内在解放区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对王实味的批判，显然有着解放区内外特别复杂的因素。单从文献的角度看，这场批判运动事实上一开始就脱离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为什么批判王实味呢？批判会的主持者公然宣称：“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

① 茅盾：《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1946年1月《文联》创刊号。

② 《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七月》1938年第7期。

③ 《文艺阵地》1938年第3卷第1期。

同志们在座谈会揭发了的许多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sup>①</sup> 未经核实，人们在座谈会上即席发言“揭发”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一个人是“托洛茨基分子”从而置人于死地的运作方式，这种非学术的学术批判，当时不仅制造了王实味冤案，而且1950年以来学术研究中发生的诸多事件，也都和这一思维习惯和运作方式有关。权力盖过了真理。政治运动式的“学术研究”没有对文献、对史实的尊重和敬畏，它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值得提出的是，就学术的角度来说，王实味事件的文献问题至今并没有真正澄清。如有的论者认为，从批判王实味开始，“康生就插了一手”，“随着对王实味问题的揭发，批判逐步升级，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他的问题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延安文抗理事会接受了群众要求开除王实味会籍的动议后，“毛泽东也接受了王实味是托派分子的说法”。<sup>②</sup> 论者提出的毛泽东被动地“接受”“王实味是托派分子的说法”的结论，似仍需要充分的史实作依据。事情也许远为复杂。看来，彻底廓清王实味问题，可能还要进一步从发掘和辨析文献入手。不阅读原著妄下断语，当然不仅仅是20世纪40年代意识形态冲突空前尖锐时期的伴生物。早在20年代，这种虚浮学风事实上已经在学界有所抬头。比如，1926年陈西滢就宣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了日本盐谷温教授著《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部分。对此，鲁迅后来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反驳说：“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sup>③</sup>

学术研究不以文献为前提，有形无形地受意识形态主流声音的制约，甚至直接演绎政治观念，不仅使研究的知识密度不足，写不出客观的、完备的、因而具有稳定性的学术著作，而且还会造成文献原有意义的瓦解。

第四，在编辑、出版作家著作的过程中，较普遍地存在着任意删改原作现象。20世纪中叶以后，出于多种原因，文学史料和作家作品的出版，

<sup>①</sup> 逄迈：《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

<sup>②</sup> 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sup>③</sup>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0页。



一直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修改原作现象。如有的学者提出的“绿皮书工程”<sup>①</sup>，又如一位青年学者在现代长篇小说考察中列举的具体实例<sup>②</sup>等，都对这一现象进行过富有创新性的研究。在当前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竞相出版之时，任意修改、删改原作的现象更日显突出。

《老舍全集》19卷本<sup>③</sup>出版后，老舍研究者张桂兴出版了52万余字的《〈老舍全集〉补正》。<sup>④</sup>该书对《老舍全集》“指正数千处错误，补充十几万字文稿”。<sup>⑤</sup>根据《〈老舍全集〉补正》提供的资料考察，人们看到，1999年版《老舍全集》除政治性的改动较多外，许多改动还多涉作家的思想变化，添加了作家深刻反省、自觉改造的内容，遮蔽了作家在特定语境下的时政性言论（今天看起来特别刺眼的言论）。如1950年8月20日刊于《人民日报》的《老舍选集·自序》说，“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到了19卷本《老舍全集》，作者这句客观的自评，则变成了一大段痛苦的自责：“最糟的，是我，因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写了《猫城记》，在其中，我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当时的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们的热诚与理想。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老舍1957年9月22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白石夫子千古》，悼念齐白石先生。在《老舍全集》中，文章把有关反右派的内容一律删去了。如删去：“夫子病逝的时候，正值北京国画界进行着反右派斗争。国画界的右派分子的首要罪行，即在打击新生力量，打击新的创造，以便他们抱残守缺，而自居优良传统的继承人与保卫者，称霸画界，垄断市场。他们既破坏了团结，又阻碍了绘画的向前发展。他们与白石夫子所走的显然不是同一道路。他们的小集团，恶毒地攻击集团以外的一切画家。这又与白石夫子完全不同。”紧接上文又删去：（我切盼国画界）“能够深入再深入地继续反右派斗争，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

① 参见杨义《五十年代作家对旧作的修改》，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9期。

② 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 《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张桂兴：《〈老舍全集〉补正》，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

⑤ 王任：《呕心沥血舍予情——记老舍研究专家张桂兴教授》，《现代教育导报》2002年11月21日。